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每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三月七日　每份售八萬元

第四卷　第十九期

專論

杜威入選與對華政策　費孝通

改革幣制有辦法嗎？　夏炎德

蘇聯即將東顧　丁驌

倫敦通信

英國人看中國　田汝康

生活與文化

退無以守．進必以戰　劉緒貽

觀察通信

開封失陷．在京豫人請願詳記　觀察讀者投寄

關於雲南最近治安情形的詳細分析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殤　汪銘

書評

讀胡適之先生校足本密爾自傳書後　吳恩裕

讀者投書

宋子文的平行公路　重慶搶米記

寧波搶米記　新文字

一位老太太的血汗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三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九十六萬
掛號：一〇八萬
航寄：一二〇萬
航掛：一三二萬
郵資漲價・酌扣寄刊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一百萬
郵費：掛號每冊十三萬
航掛每冊廿五萬

叢書加成數

照定價三萬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八千萬元
全面七千五百萬
普通　半面四千萬
1/4面二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退：附郵二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三萬元
如欲退稿・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復

定戶注意

讀者函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TV宋的平行公路

編者先生：朱子文（廣州人叫他做TV宋）主持粵政，經已九月。關於粵省治安，當初曾在省參議會上開出了一張期票，保證三個月內可求安定，六個月後可肅清匪患，雷聲相當大。不幸的是廣東是中國政治圈中的一環，一切都逃不了時代的考驗。他既沒有奇蹟可發生，所開的支票自然也就無法兌現了。事實是粵省治安愈搞愈糟。東、西、北三江水運固有困難，全省公路亦有四份之三不能通車。甚而粵漢鐵路亦時有劫車燬橋的事件發生。治安的嚴重，使他不能不焦灼起來！

最近他為了要保護華南唯一大動脈的粵漢鐵路，特地發動修築一條與粵漢路平行的公路，以作運兵之用。該路的招牌是『廣州綏靖公署廣韶西線』，起自廣東花縣，止於粵北韶關。全長約二百六十公里，並規定與鐵路平行的距離，最遠不得過五公里。因為他大權在手，已於本年六月初旬征調了粵漢鐵路、來湛鐵路、廣東省公路處、交部公路第三區局、和交部第二機械築路隊等五個機關，成立了五個工程處，分段興工。這件事情，現在正是鬧得滿城風雨。有的說TV宋有辦法，扯得開；有的則說烽火已燒到最後的一條大動脈，偏安也有問題了。

我是個學工程的人，我看這不僅是TV宋個人的智窮力竭，舉止失措，而是表示政府對「剿匪」無辦法，一切的掙扎都是迴光返照。因為：

一、廣州韶關間，本來就有一條廣韶公路，經花縣、從化、佛岡、翁源、而達韶關。和粵漢路亦大致相互平行，而且所距鐵路最遠之點亦不過二十六公里。現在因為佛岡是共軍的大本營，不能通車，而想再造一條公路來保護鐵路，豈不可笑！彼既可失，怎能保此不丟？本人日前曾沿線踏勘該路，得知粵漢鐵路兩旁，尤其是英德和清遠一帶，到處都是共軍，隨時都有被他們破壞和切斷的可能。只因共軍也需要利用粵漢路，所以和當地防軍互有默契，你不打我，我不犯你，大家在做着變活。更令人吃驚的是，英德和清遠的茶樓酒館，每天都有八字脚的人物在品茗，跟走私漏稅者大談生意經。再想假如共軍一天打到這離開鐵路僅五公里的廣韶西線，則這條鐵路還有什麼用處？那末，為甚麼還要築這樣的一條公路呢？

二、站在工程的立場上說，鐵路所走的路線，當然是平敞大地，以省土石等工程費用。因此鐵路兩旁自是一些良田美地，當年築路時，老百姓已不見了若干財產，現在緊靠鐵路旁邊又來造一條公路，老百姓的苦痛，不問可知。本人和他們談到路線的問題時，他們無不抱着與土地共存亡的決心，誓死反對。這樣一來，結果恐怕不是「剿匪」而是「造匪」了。還有一層，這條公路的標準特別低得可憐，因為路基僅寬五公尺，坡度可大到百份之十五。抗戰時，在內地跑過的人大概還會記得貴州境內的七十二灣和二十四拐，但那也不過是百份之十左右的坡度。如此的廣韶西線，不管牠是軍運或商運，總之是毫無價值可言，簡直是勞民傷財的一種舉措。但TV宋為什麼要如此幹？除了政府對共黨已弄到水窮山盡，見一步走一步而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解釋的了！

王兆和　六月廿二日　廣州

重慶搶米記

編者先生：六月十六日的傍晚，重慶觀音岩發生搶米的事，想早已聞知了。（編者按：本刊上期已有通信報導此事。）

現在我仍願意對這件事略略報告一下。當天晚上是這樣的：附近一帶的貧苦市民，如黃包車夫之類，他們窮，買不起一斗兩斗的米吃，只能在找來一點錢的時候去買一升半升米，以飽全家人的肚子。在十六日的上午，曾有人拿着六萬塊錢去某米店買米，但老闆告訴他說：「現在漲了，要八萬一升。」這人失望地回到家裏，好容易湊好八萬，下午去買，米又漲成十萬，他又回家，湊了十萬，立即跑去米店，（那時已有很多買不起米的人站在店外看它漲。）但是老闆說：「米又漲了，十萬買不到。」在這種情形下，不免發生言語上的衝突，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結果老闆發火：「嫌漲呀！我不賣了！」這樣一來，激起了公憤，在窮人心裏的恨火燃起來了，只要有人吼一聲喊打，立即就全體動員搶起來了。

雷銳軍　六月廿二日　重慶

寧波搶米記

編者先生：寧波倒底還有一點聲音，本月十四日的下午發生搶米的事情！黃包車夫，碼頭脚夫，乞丐，在那天下午，他們成羣結隊闖進了米店，向那疊得高高的米袋，喊出飢餓的憤怒。他們扯開了袋子，用淘籮，用面盆，甚至把衣袋裝得滿滿的。他們又把米店老闆拖出來一頓「毒打」，有人這樣喊：「打死這黑良心的壞東西！」

警察先生也管不了，他們限於職務，實際上心裏也着實羨慕。搶米是全縣性的，寧波的警力本來就單薄，這一下也就鬧大了，後來，不死不活捉到幾個「暴徒」。

關於這次風潮的起因，我引用本地報紙的一段報導：

「本埠近來物價直線上漲，尤以米價為甚……昨日一日間，米店舖門售價，竟自九五〇萬，而九八〇萬，而一〇二〇萬，而至一〇八〇萬，小米舖則有減價至每石一二六〇萬者。自晨以迄午後，售價屢更，漲風之盛，已入瘋狂狀態。升斗小民，莫不叫苦連天。開明街蓮與昌米店首遭貧民擁入搶米，風氣所播，霎時蔓延城區各處，成羣結隊，呼囂震喊，爭先恐後，勢如潮湧。彈壓警隊，疲於奔命。此等貧民搶米，多以淘籮，面盆，小米袋及衣帽等器貯盛，沿途狼藉，散佈滿地，猶如飛雪。……」

事後統計，被搶米店有四十家之多，從下午四時起至十一時止，其中一家損失六百石之多。

鄭義　六月二十三日　寧波

新文字

編者先生：貴刊近來有幾篇討論「漢字改革」的文章，讀來很有興趣。我對此一問題，亦曾研究，覺得原則上，能用新文字，實是最為徹底。此次劉學濬先生對新文字曾加攻擊（四卷十六期），鄙人願向劉先生提出一點不同的意見：

首先劉先生說老百姓不學外國玩意，這話聽來有理。但是那一項徹底的改革能輕易為普通人所接受呢？提倡白話的初期，不也曾遭遇各式各樣的反對麼？等到成效大著，老百姓也就不會再反對的。所以問題只在新文字是否易學易寫。劉先生又說「世界上沒有一種人造語言可以通行」。這話也對。可惜這一槍又放了個空。因為新文字並非人造語言，咱們說的仍然是中國話，而非外國話。只是不用方塊字來表達，而用拼音的新文字來書寫而已。土耳其在凱末爾將軍革新政治的時候，採用拼音文字，改革古舊的國文，獲得成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蘇聯各民族，採用拼音法，創造了許多新文字，各落後民族的文化教育因而大大提高，更可供劉先生參考。提倡新文字並非拿老百姓作試驗品，正因為老百姓根本沒有文字，（漢字並不屬於他們，他們也並不迷戀漢字），所以

（下接十一頁）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十九期
三十七年七月三日

本期作者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夏炎德：復旦大學教授
丁　驌：中央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汪　銘：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杜威入選與對華政策

——三論美國大選

費孝通

美國共和黨已在二十四日的全國大會中選出了湯姆斯・杜威做該黨本屆總統候選人。這結果並不太出人意料，注意這次共和黨大會的人感覺到有興趣的是杜威勢力的雄厚，在第二次投票時竟以三十三票之差靠近半數，這聲勢逼使其他候選人知難而退，終於在第三次投票時造成全體擁護的記錄。這表示什麼意思呢？

就共和黨黨內的分歧點說，比較重要的有兩派，一是擴張派，一是經濟派。擴張派主張趁美國大戰餘威建立「美國世紀」，他們是代表大企業利益的；經濟派主張減低政府費用，縮緊稅收，使中產以上的人的收入增加，因之對於大量的援助外國的國際政策是反對的，最近在國會裏所提出的削減外援法案的就是他們。這兩個勢力多少有爭執的地方，在這次共和黨推選總統候選的大會裏，觀察者預料有一幕精彩表演，但是這表演却沒有正式上場。

杜威是被認爲偏於擴張派的，他的智囊就是被維辛斯基指斥爲戰爭販子的杜勒斯。杜威如果當選總統，一般人都認爲國務卿一席將屬杜勒斯。換一句話，美國對外政策將繼續杜魯門主義，因爲杜魯門主義雖則名義上是杜魯門的，但實際上却大部分是杜勒斯的。

經濟派雖則在共和黨裏面的傳統勢力裏有相當可觀的潛勢力，但是拿不出有力的領袖人物來。他們所擁護的塔虎脫並不肯明顯的代表他們。他們在這次削減外援法案中也祇表示了潛在的勢力，但是並不能有決定性的壓力。在這次共和黨大會中，他們竟沒有阻止杜威順利當選的力量。這表示了共和黨的後台華爾街勢力的強項。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去，經濟派在國會裏表現了他們潛勢力之後，在選舉總統候選人的大會却又這樣順服，可能又表示了政客間的妥協。杜威是個機警的政客，他在競選初期一貫的保持模棱的態度。爲什麼呢？他的目標是地位和權力而不是主張。對於這種政客，主張是可以變的，因爲在以爭奪地位和權力爲目標的人，主張祇是手段。杜威的記錄表示他是屬於這一類的人。在上一次競選時，他起初是反對租借法案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他說租借法案「將結束美國的自由政府，在一切實際的作用上取消了國會。」）但是後來就「食言」了。慣於食言的是政客，不是政治家，因爲政治家的目的是在實行一種主張，政治地位和權力不過是實行主張時必需的手段；政客則反是。杜威在這次競選中比較老練了，爲了說了話有食言的可能，所以索性不說話，少說話。

杜威必然把共和黨裏潛伏的經濟派的勢力估計得很周到。他怎樣才能取得他們的選票呢？在這一點上，我們會在今後，尤其在他當選總統之後，看到這位政客的手法了。

× ×

我們最關心的自是杜威有關對華政策的見解。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却應當很小心，不然就容易上當。今後幾個月在美國是政黨間的競選高潮，競選必須找到自己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去發揮。如果大家是一樣的，也就無所謂選爭了。我們展開共和黨的競選政綱，實在看不出和杜魯門在他任內所做的事有甚麼不同之處。以對外政策說：杜威明白表示的主張是：「加强美國，擴充空軍，重建情報組織，實現援歐計劃，支持希臘。」這都是杜魯門的老調。在這樣相同的主張中，一定要挑出一點相異，使他在競選中可以借題發揮的，却是「援華計劃」。所以我們可以預料杜威會一再提到這題目來做文章的。

美國的對華政策確是馬歇爾傷腦筋的隱痛。他的援歐計劃是一般選民所擁護的，這是他的王牌，杜威如果要在這方面去立異，不但得不到同情，甚至會失策。但是對華政策却不然。馬歇爾的援華是三心兩意的，至少在美國人看來，這也是個値得發生疑問的政策。如果美國要反蘇，怎能在亞洲留一空隙？邏輯上推論，應當趕快全力援華；如果美國要反蘇而認爲中國沒有合格對手，馬歇爾的等待主義也不會有結果；如果美國願意把遠東大陸劃出反蘇區域，這種拖宕政策反而造成

美華之間的緊張。說來說去，馬歇爾葫蘆裏賣什麼藥，還不是大家一看就會明白的。這裏正是共和黨攻擊的好題目了。

共和黨借對華政策為題向馬歇爾攻擊已經很久了，這種攻擊可能還要鬧得響一些。把馬歇爾的威望打擊一下也就是給共和黨多一些選舉勝利的機會。——於是對華政策將成為美國政黨政治中的皮球了。

×

如果「對華政策」成了一個競選中的題目，當足球被人踢來踢去一陣子，人們很容易弄昏了頭腦，把他們所說的話認真起來。我想提醒大家的，即美國競選運動的話是千萬認真不得的。共和黨可以口口聲聲說要一反馬歇爾的陰柔寡斷的作風，卻並不就是說他們上了台，一定會大大的改變作風。

決定對華政策的是許多實現的條件，這些條件不變，政策的內容也不會改。什麼條件呢？第一是美國有沒有能力在援華政策下解決中國現在的內戰局面？第二是美國是否真的必需解決中國問題？

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那是反面的。除了美國出兵，要在軍事上解決中國問題，大概是很難有希望的。而美國出兵遠東不但現在不能想象，將來也很難說。共和黨上台後，出兵的可能性是否增加呢？我的看法是相反的。現在削減援華金元的是由共和黨主動的。這裏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共和黨裏的經濟派固然不能搖動援歐的基本政策，但是要敷衍這派勢力，遠東卻是一個可以妥協的地方。在美國支持的中國新內閣剛剛上任時，在他們所支持的國民政府面臨經濟和軍事極大危機時，國會撥款委員會能把已通過的援華數目削減是極堪注意的。說穿了，這是個政黨政治中富於伸縮餘地的妥協地帶。——當足球的命運就是如此！

最近共和黨機關報上暴露為中國政府發言人所不堪接受的評論也是一個警告。

如果我們認為共和黨即使上台、杜威入主了白宮，甚至蒲立德出使南京，美國整個外交政策還是杜魯門主義的繼續的話，美國對華政策還是馬歇爾路線。至於上述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是反面的。美國並無一定要解決中國問題的需要。

馬歇爾並不真是忘情於中國，他不是沒有政策，當然有的，不可能沒有。他的政策是不把這盤棋下死。在我看來，這裏留着一個活動的棋子，要等着以後下。他不願意中共佔領大陸是事實，但是要美國出全力來趕垮中共，他也是不願，也可以說不能。他要拖，拖到棋盤另一面有了「打結」的機會。

說美國一貫的要和蘇聯求戰，這是不合事實的。他們想做到的是勢力範圍的劃定。這一層意思我在「和平之謎」（觀察四卷十四期）一文中已說過。美蘇總有一天要攤牌的，在攤牌時，戰或和，都得有個交代；戰的話，要選擇有利的戰場，遠東沒有這資格；和的話，要講條件，遠東是一個商量的餘地，下棋打結時割捨的代價。

共和黨上台之後，是否會促進攤牌的時機呢？我想是的。莫斯科不要戰爭，但是一時也不肯攤牌，因為美國今後四年的白宮主人還沒有選出來。至少現在還有一個美國政治變動的可能。華萊士還沒有認輸。如果共和黨勝利了，局面定了，蘇聯為了和平，為了避免戰爭，不會拒絕攤牌的機會。到這時候，美國對華政策的面目才會全盤暴露。

×

以上說的話，說得還是太早；杜威有多少把握入主白宮，還在未知之數。回頭看看杜威出面競選總統以後，美國大選的風向。七月十二日民主黨也要選舉他們的候選人了。這個大會的熱鬧情形可能要比共和黨更精彩些。杜威是個勁敵，在上一次大選時，他和羅斯福還堅強較量過。如果民主黨推不出一個有力的候選人出來，換一句話，如果杜魯門出面和杜威競選，那很可以說是「認輸」的姿態。

杜魯門沒有機會被推為候選人了麼？那卻未必。我在以前兩篇論美國大選的短文中曾指出美國政黨基礎正在改變的過程中。保守勢力和進步勢力正在分化。華萊士既然在團結進步勢力，保守勢力也必需自謀團結。在保守勢力方面卻有共和民主兩黨的分化。如果要團結保守勢力因之也必需儘量把原有政黨的分化予以減弱。減弱政黨分化的方法是舉出一個能團結保守勢力的出來，同時避免保守勢力陣線中自己的競爭。杜威是有力量和有威望的，如果民主黨擁出一位同樣有力的人才出來，保守勢力不是會分化了麼？為保守勢力打算，自然是要一位一定沒有當選希望的人出來充數；那就是杜魯門。在這個意義上，杜魯門是有被推為民主黨候選人的機會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一個預測，因為我並不知道保守和進步兩勢力的分化和各自團結已演進到什麼程度。美國這個政治程度較低的人民是否能在過去一年中發生我所指出的分化，我無法斷言。如果這分化的趨勢並不深刻，民主黨不能不推出一個壓得住杜威的人才出來。誰呢？最有可能性的是拒絕做共和黨候選人的艾森豪威。這位將軍是否肯出馬，到現在為止，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時間過得很快，兩個星期之後，共和，民主兩黨的候選人都可以選出來了。最後的一幕將是在報紙上好像很冷落了一陣的華萊士表演。我們等着瞧罷。

幣制改革有辦法嗎？

夏炎德

幣災泛濫，物價狂跳，小民將活不下去，動搖到整個的現局面，幣制是非改革不可了。

顯然，現在的問題不在政府想不想改革幣制，而在政府有沒有實力改革？客觀上是否已具備改革的條件？新幣制將採什麼方式？這種辦法是否行得通？

改革實現後是否能够解決問題？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爲幣制不是單憑主觀的意志就能改革，而且這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可以自行解決的問題。

眞正的說，一個國家要改定幣制，或重建她已損壞的幣制，使其發揮固有的功能，必須具備下列各項條件纔能實現：（1）財政收支恢復平衡，即政府有足够的收入，無須仰賴發鈔以應付支出；（2）國際收支恢復均衡，在對外貿易上能收支相抵，或有其他辦法如無形出口、外來投資、及借欵等、可以抵補，能够維持一個穩定的外匯率；（3）生產水準恢復正常，新貨幣發行後不至因貨物供應缺乏而降低其購買力；（4）一般經濟狀態恢復正常，不至擾亂或抵消新幣制發生的功能；（5）政治上統一，在幣制推行時不生行使主權的障礙。這五個條件如果不具備或不完全，則改革幣制的目的將不能達到，至少新幣制在作用上須打極大的折扣。

幣制改革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蘇要到一九二四年、英國要到一九二五年、法國要到一九二八年纔實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要到去年底、法國要到本年初纔實行；有許多還行得很勉强，結果未必都圓滿。

我們反躬自問：我們現在具備了這些條件嗎？坦白的說，一個都沒有。要等待這些條件成熟，不知河淸何日？然而這時期的生活怎挨得過去？

事情在乎人爲。在未定的局面下不是不能找個權宜的辦法。在勝利復員以後，中國雖不能從事根本的幣制改革，但可以作一個過渡性的改革，作爲根本改革的準備步驟。我們深知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幣值既不穩定，而欲求財政經濟恢復正常，正如南其轅而北其轍，國內外收支的缺額只有愈來愈大，朝後將不堪收拾。前後想想，只有把握改革幣制的主動之一法，使幣值與物價有一初步的穩定，則正常的生產事業可以推動，稅收可望增加，貿易可有起色，收支逆差可能矯正。如此過了一個時期以後，在一切恢復正常的狀態之下，便可從事根本性的改革。這是我在戰後所持改革幣制的理由。

在當時上海幾家報紙的座談會上，我會這樣主張。我這樣主張完全是站在民生的立場和國民經濟的立場，雖知政治條件不具備，然就幣制改革本身講，那時時機還不算太遲。因爲那時候政府還掌握着許多物資，還有大批的黃金與相當多的外匯，財政與經濟的情形還比今日爲好，人心還是寄以許多希望，如果政治能够民主，有遠見與魄力的政治家抓住機會大胆做去，事情還有可爲。

何如這個政府中掌握財權的官僚們，以及周圍的策士們，沒有眼光，泯於預算不平衡不能改革幣制的公式論，沒有看淸經濟下移的局勢，不知把握改幣的主動，沒有決斷，沒有勇氣，不能抓住時機，坐讓初步改革的時機過去了。最高當局在過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以後也覺察到這一點，會大駡他這些屬官的無能。但是有什麼用呢？失掉的機會總是失掉了。

現在鈔票的發行額已如江河泛濫，流通速率已如風馳電掣，物價一日數跳，干靑雲而直上，一切已呈通貨膨脹末期的現象，整個的社會經濟已到了總崩潰的邊緣，如果政府再不打出這張王牌——幣制改革，一切都要完了。於是行政院裏、財政部裏、立法院裏、全國經濟委員會裏，一片喧嚷，高唱「幣制改革」，甚至販夫走卒，街談巷議，也都在伸長頸子等着新幣制的分曉。

時間是無情的，機會不等待人。到了這樣山窮水盡的局面，再談改革還來得及嗎？環境既不容幣制改革，又不容幣制不改革，世間尙有比這更尷尬的局面嗎？

此際且慢談大勢是否容許改革，先看看政府裏面有什麼辦法？事情是明亮的，一切都得看美援。大家看貝祖詒以技術考察團的名義飛來飛往，美籍記者守口如瓶的樣子，可知暗中定有接洽。他是政府方面的理財家，不是別的技術專家，所談的必屬幣制無疑。幣制的變動影響經濟太大，談判不能不秘密，在事機沒有完全成熟以前，不能輕易示人，也是理所當然。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來，談判的門戶是開的，怕還沒有得到成議。陳立夫以官方的資格在美會否認幣制借欵的傳說，可以窺見進行並不順利。在這樣的局面下，以美國對政府的估量，要她拿好幾億美元出來贊助中國作沒有把握的事，美國的承諾怕不會輕易給的。

改幣非美援不成，然而無論如何，政府方面總得有它的準備。且看政府將採什麼幣制計畫？金本位固較理想，但中國不是重要的產金國，產金的東北也不在政府控制之下，政府的存金幾已拋光，美國也決不會以借大數額的黃金借給中國，故不必去夢想。外匯本位在舉世美元荒、政府外匯枯竭的今日，也不必去空想。紙本位本身不一定壞，也不受準備拘束，不過要政府信用鞏固，而且要管理得當，這在紙弊百出中嚇壞了心的中國人民，即使有個好政府來好好管理，也不易取得信任，何況政府的信譽又顯得空前低落呢？於是大家想到實行過時了的過去實行過的銀本位。銀本位之爲落伍，爲不合時宜，爲近代國家所棄如敝屣，是稍有常識者所知道的，政府的專家也不會不知道。不過他們還是主張銀本位，我想理由不外是：（1）非金屬本位已不足取信於人，而金本位不可能；（2）中國向來是銀本位的國家，用銀已成習慣；（3）銀本位的成本較輕，又爲他國所不用，借銀比較容易。可知他們並非有愛於銀本位，其所以主張採之者在目前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不過銀本位有好幾種：有銀幣本位，有銀塊本位，有管理銀本位，究竟採用那一種呢？

如果實行銀幣本位，那就是恢復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之前的幣制。一面鼓鑄銀元，一面發行鈔票（或稱爲銀票），等價行使，兩者可無限制兌換，沒有昇水貼水，銀幣可自由請求鑄造，白銀可自由存儲，銀幣銀塊可自由搬運並輸出入。在現狀下採行這種幣制，儘管在法律上銀元銀票等價，而人民心理必重元輕票，市價不免有軒輊之別，昇水貼水猶其小焉者，其自然之結果，將服從格里襄「劣幣驅逐良幣」法則，銀元被窖藏起來，市面上將只剩銀票行使，如果二者可無限制相兌換，中央銀行所備銀元勢將於短期內告罄，銀被當作貨，依然是一個紙幣世界。

銀塊本位比銀幣本位略爲穩當，即銀塊存於國庫或中央銀行，銀票流通於市面，銀票可以兌換銀塊，以昭大信，故銀塊（或銀錠，即俗稱銀元寶，以稱

兩分大小）準備須很充實，但兌換必不太自由，因爲如果自由兌換，銀塊或銀錠也將不久兌完，大概要積相當額的銀票纔能換一銀塊或銀錠，手續上也一定很費周章，務使大家不輕易去掉換。但錢多的人和懂得門徑的人，仍是會儘量去掉換，結果銀塊勢必入於大戶手中，重蹈政府過去拋售黃金政策的覆轍。

實行管理銀本位嗎？有一定額的白銀存在庫中做準備，以此爲基礎發行適當額的鈔票，以供買賣、借貸、與納稅之用。鈔票不能兌換銀塊，但白銀準備額有一定的數目，發鈔也有一定的數額，將委一個檢查委員會按期檢點銀準備公告，以示監督而昭信用。這個委員會的人選大概不出工商鉅子、金融鉅頭、社會聞人、或民意機關代表。但是這些人都是接近政府而遠離民衆的，因而這種形式的檢查是否可靠能否取信，頗成問題。多數人民在飽受欺蒙之後，已經不見白銀不得放心。故這種辦法在政府或較便利，在民間或最不能滿意。

上說的幾種銀本位，不論銀幣本位也好，銀塊本位也好，或管理銀本位也好，必須得够保證物價的穩定與匯率的穩定。物價的問題比較複雜，不容易限定在某一水準，但匯兌方面必須相當釘住，雖然不能十分硬性，但在小限度內的彈性匯率非定出一個不可，而定出以後必須能够維持，勿使超過這個限度，惟有這樣，新貨幣的價值纔能確定。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是必要的，它並須在公開市場上無限制的賣出買進，政府方面必須有充分的實力才行。如果外匯仍如今日一樣的統制，則黑市外匯將無法消滅，官定匯率只是一個形式，而新貨幣的價値將相對地一再低落，以至新貨幣信用又成問題。

這不過就匯率說，講到物價，牽涉更多。就純貨幣方面說，新貨幣的價値要看它對於貨物的購買力。目前人心重物輕幣是事實，在同一空間同一政府下時間連續中，即令別的一切都有辦法，要轉變這種心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依貨幣數量說，祇有在「其他情形不變」的條件下，物價與幣額纔成正比。而所謂其他情形，如生產已萎縮到這個地步，如運輸已阻塞成這個樣子，要它增加，要它暢通，一時談何容易。貨產不豐，來路稀少，即令貨幣額穩定，物價還是不會穩定。這固然是貨幣以外的因素，但對幣制的成敗正有着極大的威力。

至於財政收支情況的惡劣，更是不可爭辯的事實，連財政當局也不諱言。據六月十七日王雲五在立法院報告：本年上半年度中央政府的收入估計爲五百四十萬億元，支出爲三百萬億元；而五月份的支出爲七十五萬億元，收入祇有十五萬億元。換句話說，五月份的支出與收入成五與一之比，正常的收入（包括租稅、公債、規費、國營事業等收入）只能應付五分之一的支出，其他五分之四須靠增加紙幣。這樣大的財政赤字額，必須在發鈔之外另謀塡補，如征收財產稅與大批美援等，新幣制纔不至受財政的妨礙。當然我們不否認，幣制改革有辦法，租稅與公債收入可略爲增加，但以工商業如此凋敝政府債信如此低落，即使增加也很有限。若財政收支無實質的改善，縱然發行新幣，財政部仍必要請經理國庫的中央銀行墊款，中央銀行既無點金之術，只有乞靈於印刷機，如此將仍然走上通貨膨脹的老路。

認眞說來，通貨膨脹是戰爭的副產物，二者實結着不解之緣。通貨膨脹直接的原因是財政赤字，財政赤字的造因是戰爭。現在內戰正打得難分難解，戰費的消耗是無底之洞，以後財政赤字只會增大，通貨膨脹的根源有加無減，而想停止膨脹或免除其禍害蔓延，其可得乎？

王雲五在立法院的報告中還說：截至五月底止，法幣的發行額是一百三十五萬億元。在較早的時候蔣主席會宣布：截至三月底止，法幣發行總額是七十萬億元。在更早的時候銀行界方面的消息，本年初的法幣發行總額是三十五萬億元。其增加的速度，年初到三月底是三個月，增加一倍，三月底到五月底是兩個月，增加一倍，照此下去，加倍的時期還要短促，而幅度還要增大。即以兩個月加倍計，則到本年除夕時總數將增至一千六百二十萬億元。這樣法幣將成歐洲後的紙馬克第二，而接近於破裂點。

隨着這種危機的迫近，幣制改革的調子越唱越響了。有時所得消息，竟非常具體：如說新幣爲銀幣，重四錢二分，模型正面是國父遺像，背面有交叉國旗兩面，一說已在鑄造中；新幣與美元的比値將爲四比一，新幣（銀幣）與舊幣（法幣）的收兌率定爲一比二十萬，說是因爲在五月底法幣發行額相當於戰前的二十一萬倍，新舊幣將於幣制改革令發布後的四個月內收兌完畢。在根本辦法沒有弄妥之前就有這樣具體的消息，究有多少眞實性，實不能無疑。但有一點可以判定的，就是在現狀下，硬幣決不會流通，重建銀本位決沒有放棄銀本位那樣容易。中國過去銀本位的摧毀者是美國，現在果將藉美國之力以重建嗎？一切須待事實來證明，我們不欲多加揣測。

幣制改革的調子已經唱老了，這裏面沒有可逗人希望之處。主觀的意志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負責當局反覆不負責任地透露改幣的計畫，而不能以有效的方法使其實現，除了增加人民失望並刺激物價漲風外，實在毫無意義。而他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不難了解：就是新幣制的建立還沒有把握，而舊幣制已殘破到了維持不下的程度，一切救治的辦法已經失效。但舊幣制的崩潰並不就是新幣制能建立的保證，更不是新幣制能施行成功的保證。

中國舊社會經濟的病太深了，當初發病固由通貨膨脹所引起，而今諸症併發，病狀已險惡到如此程度，改革幣制決不是仙方靈丹。我們不能希望有奇蹟出現。那些以爲改革幣制可一了百了者，眞是非愚即妄！

觀察叢書

三萬倍發售

1.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新出）　張東蓀著（十一元）
2. 政學罪言（再版）　潘光旦著（二十六元）
3. 唯物史觀精義（三版）　吳恩裕著（八元）
4. 鄉土中國（三版）　費孝通著（十二元）
5.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再版）　吳世昌著（十元）
6. 英人、法人、中國人（再版）　儲安平著（十二元）
7. 論雅俗共賞（再版）　朱自清著（十二元）

郵掛包紮費：一册二萬，二册三萬，三册四萬，以此類推。

蘇聯即將東顧

丁　驌

蘇聯一直是顧及東方的。雖然沒有直接明顯的表現，但在東歐的一切手法，在遠東仍舊在進行，而且正待收獲。所謂「即將東顧」，就是說，她將來割取所種的產品。

今日任何國家欲求存在，要看這國家的執政者，是否在戰略和政略方面具有地理思想，是否想到世界在地理上乃一整體。蘇聯這國家是以世界爲理想的。他的作法處處都表現着對地理因素合理的適應。而她們的決定是穩定不拔，推行着一定的政略和戰略的原則，從無變異。所表現的外交動向與姿態，也許目迷五色，骨子裏是一樣的內容。

今日世界有三個國家，有強國的資格，即中、美、蘇是。三個國家都是地大、物博、人多，由對日、對德的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法，唯有中蘇美的土地廣大，人力充沛，才可以如此。可是三國之中惟有中國是弱國。因此這具有強國的潛力的中國，一定成爲美蘇角逐的對象。

在美國的立場看。日本將來應該成爲他太平洋的前衛。日本的海軍，可以抵禦蘇聯，因爲蘇聯者，並非一海軍國。蘇聯天然的賦予，沒有給他海軍國的海洋與海港。僅僅有波羅地海及海參威是不足以建立強大的海軍的。日本的陸軍，必要時也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和蘇聯陸軍對抗。如果說美國沒有扶植日本，那是句外交辭令。美國的政略，必須扶植日本的。他不僅扶植日本，而且希望收獲一個反蘇的日本。

在美國的立場看中國。他希望一個穩定的中國，一個強大的中國。他希望獲致中國的和平，在右傾的領導下的聯合政府，必能善意地爲美蘇的緩衝，必要時爲美國的陸軍擋箭牌。聯合政府的企圖失敗之後，美國看透了一個蘇維埃式的中國無異替蘇聯在遠東建立歐洲一樣的鐵幕。其結果在大陸之上，可能不再有美英插足的餘地。因爲這樣，美國必須扶植中國，而且希望中國右傾。

在蘇聯的立場來說。蘇聯的東方、南方、西南方都有天然的疆界，如崇山、沙漠、海洋，可以做爲他的守衛線，唯有東歐方面，乃是一片平原，難易防守。也就是在那方向，是他的重要精華所在。所以他必須獲致一種保障。他的收獲是：把英、法用爲屏障的小協約國，用爲緩衝的波蘭，轉換成爲蘇聯的「鐵幕」。史實指出這種運用，蘇聯已完全成功。波蘭、芬蘭、東德、捷克、奧國、南國，都先後在蘇聯掌握之中。所有的漏洞，是地中海尚未封閉，致使土耳其及希臘，仍舊在臥榻之側。蘇聯的應付方策無疑的是支持猶太國及意大利，企圖鉗形包圍而吞下東部地中海，切斷蘇彝士的交通，再來收拾回教的中亞。

在遠東方面而論，東北、蒙古、新疆，一向是中國的屏障，猶如捷克的蘇台德區。希特勒解除了蘇台德區的武裝，置捷克於卵翼之下。故東北、蒙古、新疆已在蘇聯控制或掌握之下時，中國的北方的屏障已經完全撤去。

若果中國是一個左傾的，甚或是一個蘇維埃式的國家，蘇聯一定可以放心，轉向收拾回教國家，南進印度。中國果如上述，蘇聯可以把中國作爲他的防日防美的前線，不感受東來的任何威脅。這決定的中蘇之間的外交，不是什麼雞尾酒會所能解決的。蘇聯看中國的政治傾向，猶如生命，他決不會更改他的方針。

在中國方面，鉗形的方式已收東了東北的口袋。加之左傾的力量，以元朝對付宋朝的姿態，由東北而內蒙而陝而鄂，而中原。我們勿庸諱言，今日所處的局面，有史上南宋的架子。所差的就是「下江南的樓船」了。假若這種企圖是完全如願，蘇聯在東方將採取積極的行動，是毫無疑義的。所謂積極也者，無疑的是領導及策動，而不是直接參加。

蘇聯希望的中國若果不能實現，在他的立場說，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一個強大的右傾的中國，無論能否自主，對蘇聯都是一個累贅，何況中國是世界三個潛力大的強國之一，一旦養成，蘇聯在世界上的目標，一定要失敗，即使不失敗，也要遭受挫折，甚至被侵略。蘇聯豈能坐視呢？

假若右傾的中國有和平統一的希望之時，蘇聯絕不會不在幼苗未成之時來根除的。也許很早地促成了另一次的世界戰爭都未可必。

每一個國家在戰略政略與他國衝突之時，都可能成爲一個戰爭販子，今日的美蘇，在這個意義上說，都是「戰爭販子」。但在另一意義上說，每一個國家都希望以和平的手段，達到他們的政略目的。因此聯合國依然還可以開會，開得很熱鬧。這種局面終久要瓦解的。和平的手段，不能解決二強之間的基本國策的矛盾性。

在中國的立場上言。如果想週旋於二強之間，還要成功一個強國，他一定要獨立自主。中國需要一個大的改革。需要把腐敗的割去，從新生成新的組織。中國的現狀社會上大規模的封建意識仍舊存在，政府的官吏雖不乏聰明才智之士，而受牽制太多，成爲昏庸無能。軍事方面言，待遇與情緒，無法振刷壞了的紀律。政府間的所謂「黨」者，升官發財的黨有之，黨其名而派其實者有之。換而言之，黨是一個就「事」而言的集團，今日已變質成爲一個就「官」而言的集團。這種集團，沒有具體的國策，更無實行的步驟。以如此的機構，毫無策略的政治，自然不能領導中國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強國。

在這樣狀況之下，中國需要一個劇烈的變動，無論是現政府自動的，或被動的改革，我們需要徹底的刷新。

我們需要的無疑的是安定與和平。惟有這種環境，方能使我們及時自立自强，不再受制於强國之間，牽着鼻子走。

我們更需要，在分析今日中國的社會與世界的情勢上，有一個國策，來領導我們的動向。在這一點上說我們看蘇聯東顧可能做些什麼。

蘇聯的擴張，（領土的，與組織的），是民族式的擴張。在東方南方的邊境，有多少不同文化，不同民族，被吸收在他的組織之中。他也「威脅」，但有後盾的，他也「利誘」，但不是空頭支票，因此，中亞細亞、康努烏梁海、外蒙，都傾向他了。我們不要妒忌為什麼鳥不到我籠中，那是因為我們的「食」不够理想，我們所允許的，不是他們所滿意的，我們的籠子也沒有他們的可愛。蘇聯在這方面的擴張是巧妙的，但是言行一致的。

其次，蘇聯在邊境上，習於建樹小型的共和國，驅之外向。等待着機會去擴張。例如芬蘭邊境的加里里安獨立共和國，羅馬尼亞邊境的白沙羅比亞共和國，都是蕞爾小國，而一旦獲取芬、羅的土地，躍為大國的。反觀東方，在外蒙邊境的康努烏拉，已成了外蒙古的先驅者，黑龍江的猶太國恐將成為東北一部的未來主宰。換言之，蘇聯眞實地培養弱小，使之向外發展，而收擴張之效。

在東歐問題已經穩定的今日，蘇聯即將東顧，他即將前來收割他的品種、假若最合他理想的話，那就是一個左傾的遠東聯邦政府。包括猶太、外蒙、康努烏拉、土耳其斯坦、內蒙、朝鮮、甚至於泰、與苗猺，而以漢族的政府為領導。自然在蘇聯的策動或領導之下，這個政府必將為蘇維埃式的。他願意一個細分的遠東，不願意一個團結的遠東。一個聯邦式的政府，不要一個集權式的政府。儘管漢族佔絕對大多數的人口，但政治的單位上言，將成為相當孤立的。我想最近蘇聯必將十分注意朝鮮與新疆的情形，而閉目於中國的內戰。並無協助中國和平的意思，更不會實行任何條約的諾言。

我們應具有一種決定，就是我們先來做蘇聯所能做到的。我們應該能够在民族文化方面允許弱小民族的自治。但在經濟上建立超政治的單元，一如蘇聯今日所為的。我們可能有維吾爾自治共和國，在中華民國中具有一個單位的權力，但我們可以建立一新甘工業區，而將經濟的單元超覆在甘肅省與該自治共和國的組織之上。我們未常不可以建立羅羅自治共和國，而將西康與之聯繫成為一經濟單位，凡此種種，格於形式，未便多贅，我祇在此地指出一條途徑。

我只有一個希望，即希望今日當政者熟讀史地，活讀史地，眞正兌現一個國計民生的理想。他們眞想做官，也只有這樣官還能做得下去。

六月二十日

英國人看中國

（倫敦通信）

田汝康

要是用一句話來描述英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自然未免失之於武斷。想知道中國這個國家，和組成這個國家的中國人，在英國人心目中究竟怎麼樣，首先得把英國人稍稍的加以區分一下。因為英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決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甚而一個同樣的英國人在不同的時期內對中國和中國人便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當我說「中國」，我指一個民族、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單位。這在一般普通英國人心目中似乎太抽像，在這般人看來，中國和中國人是合而為一的。所以在我描述一般普通英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的時候，中國和中國人並沒有什麼分別。這個區別僅在討論英國學術界和報張雜誌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看法時才應用。

一般普通英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同樣也可以說對中國的看法）可以歸納成兩個感情的反應。這兩個反應可以毫無關係，甚而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是對中國人的惡視——因為中國人的邪惡；另一方面對中國人的同情——這是由於中國人的貧病和不斷的災荒幾乎使得英國人不相信。

邪惡的東方人（Sinister Oriental）是歐洲人對黃種人最普通的一種定型看法（Stereotype）。究竟中國人邪惡到什麼地步，自然連英國人也無法下個斷語。這個定型的看法其來已久，後面拖着一大段歷史和偏見。不過在一般英國人看來，中國人似乎和土匪和鴉片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在英國，自然，不論怎麼樣邪惡的中國人也沒有做土匪的資格。但不幸鴉片案件中却常常牽涉中國人在內。去年在一張倫敦晚報上，有一位記者曾指出，認為最近英國運毒案也不盡是中國人為首了。雖然使中國人可以稍稍舒一口氣，但可見鴉片與中國人的關係，在英國人看來，似乎已經夠密切了。其外，東倫敦的中國區在英國人心目中也是一片黑影，但是事實上，經過上次大戰的破壞，倫敦的中國區已不再存在，舊有的中國區最近已改建成倫敦市政廳的公共住宅大廈，中國人自然無資格再搬入居住。附近的小街上雖然還有幾家中國飯館和雜貨店，不時也常有些中國海員來往其間。一般情形看來既並不像想像和傳聞中的那樣污穢和可怕，就是在一般附近的英國人士說起來，種種恐怖的故事他們也沒有親眼看見過。不過不管事實如何，人類不邏輯的地方太多，我們也不能畢怪英國人，偏見一旦形成，要消除便相當困難了。

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們雖然可以詞嚴義正的來糾正一般英國人對中國人的邪惡定型看法，但我們却無法否認中國的病與窮，更不敢為了自己爭面子來扯謊說中國今年沒有饑荒沒有餓死人。對英國人同情的表現，在中國人看來，有時候感情上自然有點感得羞愧，甚而覺得是恥辱。而在理知上，除去感謝外，我們却感覺到沒有什麼話可說。『捐錢援助中國』在英國人生活中似乎太熟悉了。有一次在一個討論會上，當我談到將來中英通商可能的時候，有一位英國同學曾反駁我說，從他兒童時代起，他便常聽見中國災荒的消息，現在他已快三十歲，中國災荒還從未停止過。將來中英通商，中國可能輸出的當然祇有農產品。但中國既然是這樣饑饉不絕，他懷疑中國到底有什麼剩餘的農產品可以供輸出。這位同學的問題自然是另一回事，不過從他的言語中，中國所給一般英國人的印象是什麼便已不難想見。去年我參觀英國西部一所鄉村小學

，主持的教師便告訴我，上年聖誕節校內學生唱歌演劇曾募集得十多磅錢。這份錢後來經公決的結果是送到援華會去救濟中國的災民，因爲大家知道中國又在鬧災荒。這位教師還問不知道今年如何？情形好些沒有。同時好多個小同學也問到中國災荒的情形，他們年齡都在十歲以下，而中國的貧與病却早已在他們天眞記憶中留下一道痕跡。據我所知道，去年初英國援華會對湖南災荒的宣傳眞大大感動了英國人士。由於各電影院的協助，援華會有一節關於衡陽粥廠的宣傳片在英國各電影院放映，接着隨卽向觀衆募捐。這段影片眞感動人，觀衆的反應從募捐筒的響聲可以猜測。但因爲影片太逼眞的緣故，在這段時期中在英國的中國學生的心情眞難形容，有的同學祇好設法暫時不上電影院免得感情上難堪，有的還寫信給大使館望能交涉停止放映。據我的房東太太說，這是她平生第二次，買了一個先令九辨士座位的票子，却捐出了二個先令六辨士的捐款。她問我：中國爲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有一位英國青年看過這個電影後，私下對別人講，旣然中國像這個樣子，爲什麼在英國的中國學生還不趕快回國去想想辦法。一般英國人士對中國人的同情在上次大戰中是相當熱誠的，但隨着戰爭的結束，英國一般人士的心情也發生了改變。以一年一度雙十節中國的國旗日來說，一九四六年的雙十節，淸晨在幾個大火車站上還看到有英國婦女在向人勸募，到一九四七年的十月十日便連各大火車站上都看不到有什麼人在爲援華勸募了。據我看到僅在中國大使館附近有人在售買中國的小國旗。雖然現下英國各縣、郡的援華分會勸募工作仍在進行，但較之上次大戰中的情形已有不同。最近援華會又有新的宣傳品在英國街頭出現，標題的中國字是：『您給的錢怎麼樣幫助中國』。這種宣傳品曾用圖畫詳細繪出各種不同數量的捐款在中國能做的救濟工作，例如說，捐三個辨士在中國能買到一碗飯；十個先令能幫忙一個中國學生一禮拜，五磅錢能維持一張醫院病牀三個月，諸如此類。對於英國援華會這樣的熱心爲中國人民服務，我們對之是感激不盡的，而且在危難的時候請友邦人士幫忙也並不是什麼羞恥的事體；做這樣事體的國家也不祇限於中國。但問題是我們希望會有一天中國人能自己出力幫忙自己中國人，免得『捐錢援華』成爲英國人士生活中的經常慣例，使中國和中國人永遠同貧病災荒連在一起。

在英國報張和雜誌中，中國和中國人便似乎有分別了。因爲有這個區別的存在，所以一般的看法也便有不同。說到中國人民，大家似乎都表示同情之意。中國農民的天眞樸實以及目下不像人樣的生活，在英國報紙雜誌常有描述。至於中國知識份子目下的處境和動態，各報紙雜誌更特加重視。譬如說各地的學潮，在英國便有另外的看法，不管立場如何，一般評論都覺得這是中國目下最後的一線希望，從這一線希望中可能還會有個新局面，否則一切大致已經是命中註定了。說到中國，在報紙和普通雜誌中常常是一個政治地理單位，不同中國政府合而爲一，便同國際關係有關。民族、文化單位的中國似乎很少提到過。把中國看成一個政治單位看，則英國報紙和雜誌對中國的看法和論調便有點異樣了。從感情上分析起來，一般對中國都有所期望，（不管其動機是基於英國自身的利益或是眞正對中國有好感）因爲有所期望，而實際中國的表現又不僅令英國失望，而且同時還花樣繁多，久而久之感情上便有點異樣了。這種感情的反應，可以從孟却斯特導報最近的一篇社論裏看出來。這篇社論指出目下『冷戰』中美國在中國所受到的打擊，認爲不管美國在歐洲大陸如何苦心的抵制蘇聯勢力的擴張，但受稀少蘇聯幫忙甚而蘇聯並未幫忙("with little or no help from Russia")的中國共產黨却這樣的在中國日有進展。這篇社論說，問題的關鍵是在受美國輔助的所有國家中，祇有對中國政府的援助使人最頭痛最棘手。因爲問題是若果中國政府自身不設法澈底改革，不管美國如何幫忙，甚至於就是美國軍事直接干涉，恐怕事實上也無法阻止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發展。基於這種迫切希望中國有所改革的心理上，而中國政府的一切事實表現又偏偏與之背道而馳，於是感情上便因愛生恨了。今日英國報紙雜誌不罵共產黨不罵蘇聯的是例外，而談到中國問題一般論調便有所不同。有一天在倫敦政治學院內，一位售買共產黨宣傳品的英國青年曾對一堆中國學生發過這樣的牢騷，他認爲：『中國共產黨是今日世界上最幸運的共產黨，幸運得簡直令人妬嫉，因爲中國共產黨是在世界共產黨中最後被罵到的一個』。誠然，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但也並非不可加以解釋。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是現况太壞，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此外另無出路。中國政府官吏的操守和行政效率問題是外國報紙雜誌所最關切的課題。有的報紙講現在內戰戰場僅在華北，而政府仍控制着揚子江最富庶區域，但不知道爲什麼兩三年看不到任何建設成績？四月間泰晤士報的社論並將治理台灣的成績舉出來作爲證據。有一次『星期觀察者』（Sunday Observer）並說，目下在中國人眼光中認爲革命的舉動，在英國人看來簡直是些普通常識。意思似乎說像土地改革之類問題，照中國目下的情形，任何政府都應該趕快設法。有時候一般的筆調自然不免過火。例如四月五日星期泰晤士報的一篇論文，竟把貪污與無效率指爲中國的特色，同時還進一步把目前的貪污推到美國留學生身上去。（自然，邏輯上說不過去）。認爲目下中國新士大夫階級多是在美國受過教育的，而這般人儘管嘴上講起來像受過西方文化洗禮，而骨子裏的許多中國舊習氣（the deeply engrained traditions of Chinese public dishonesty）仍無法去掉。因此中國的貪污風氣眞無望立刻淸除。最後這位作者還把中國貪官污吏比喻做一羣蝗蟲。像這一類的看法在英國報紙雜誌中常常看到，決不能算爲稀罕。這兒所舉出的祇不過是最近的例子而已。

把中國看成一個民族、文化單位的祇有英國學術界中人，這般人不是到過中國便是研究的學科與中國有關。一般說來他們對中國都有好感。例如去年有人在一本雜誌的通訊裏問過英國名作家J.B. Priestley，問他要是有機會的話他想到什麼國家去休假。他的回答是中國。因爲從研讀中他發現中國文化的優美，而所接觸的中國朋友中又多是智慧禮讓之士，所以他很想看看中國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國家。其他如歷史家Arnold Toynbee，哲學家羅素、經濟史教授R. H. Tawney，不論在演講中或普通談話中也都表示對中國有很好的印象。有一位到中國講過學的牛津教授還嘆息說過，像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正應該站出來領導世界創造一種新文化，却偏偏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言下不禁惋惜之至。近年來使英國學術界中感覺驚異的是來英中國教授之多。有的二三十歲的青年在名片上竟自稱是幾個大學的教授，英國學術界中人最初對之眞不知如何接待是好，但後來這類例子還不斷看到，故大家也就不再認爲驚奇了。六月十四日倫敦寄

退無以守‧進必以戰

劉緒貽

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觀察四卷十六期）一文中，我們曾經指出，因爲在中國社會上，知識份子可以「用最少勞力得到最多社會報酬」，所以從事知識活動的人，往往超過了社會的需要與負担，造成不合理的社會分工

。我們也指出，這些多出來的知識份子之中的一大部份所以變成社會問題，是因爲他們在受分業訓練時，所養成的知識、技術、習慣、觀念、體力等，使他們沒有轉業能力的緣故。這是從知識份子本身的缺點說的。事實上，這些多出來的知識份子之中，總有一部份人，幷不是除了做官與教書以外便百無一用的人。這些人其所以除了做官與教書以外變得百無一用，乃是因爲我們的社會，一向是個農業的社會，不能給他們以表現其所學與所能的機會的緣故。鴉片戰爭以後，我們慢慢的覺悟，除了學習西洋的工業與技術，不足以圖存；要學習工業與技術，必得有工業與技術的人才，於是一方面派遣留學生，一方面辦新學堂，大批製造新知識份子，以圖振興和發展工業與技術，於是，有能力的知識份子更日益增加。不過，有能力的知識份子固然增加了，但他們的出路幷沒有增加，至少沒有成比例的增加。比如在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時代，由於容閎的努力，中國曾分批派出了一百多個留美學生，他們從小學起便在美國受教育，容閎的意思，是要他們不僅只學習美國讀書人的知識與技術，也要他們養成美國知識份子的習慣、觀念、與體力。後來這一批人剛剛進大學的時候，因爲國內舊勢力的反對，召回來了，出路有問題，其中有幾個，看不慣國內一切，於是再逃到美國，有一個變成了一個相當成功的報人；有一個變成了一個相當成功的發明家，他有幾件發明，是經過美國專利特許局登記了的。我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也時常遇見一些留學生，他們在外國實驗室內作研究，工廠內作工，也是個很有用的人，但他們很清楚的知道，他們回國來以後，卽使不變成百無一用，也絕不會有充分發展其所學的機會。留學生如此，大部份的大學畢業生也不能例外，尤其是那些工、農、理、醫等科的畢業生。

爲什麼我們的社會培養一大批新人才，尤其是實業人才，而又不給新事業他們辦呢？一般人往往只怪我們的教育制度失敗，或認爲我們的社會有毛病，但爲什麼我們教育失敗社會有毛病呢？分析到最後，我們不能不怪帝國主義。因爲帝國主義以武力作後盾，利用經濟侵略，窒息我們民族新工業的成長；工業不發達，其他各種與工業相關的事業如交通、運輸、金融、商業、科學等等也難於發達，因之這一批新知識份子才沒有新出路。這是中國，以及和中國這種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相似的其他各國知識活動的共同矛盾。這些國家，爲了要抵抗以現代文明爲基礎的列強的侵略以圖生存，不得不大批造就新知識份子；然而當他們沒有從列強的經濟侵略覊掌之下解放出來以前，這些新知識份子又沒有出路，變成社會的負担。一向我們愛把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新知識份子沒有出路這兩件事情分開來看，其實兩者是息息相關的。百年以來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窒息我們民族新工業的成長，我們所造就的新知識份子，只有不夠用的道理，決不會過剩的。

既然這些新知識份子沒有新出路，如我們在「狹路相逢」（觀察四卷五期）一文中所說，他們大都也只好屈服於文化的傳統，硬擠向官場與教育界。不過，如果社會的經濟基礎沒有進步，官場與教育界的容量也是很有限的。在此種情形之下，要容納每年我們爲了現代化而培養出來的大批新知識份子，（比如今年僅僅是大專的畢業生，據教育部所發表的統計，便有二萬五千六百餘人。）除非我們官場與教育界每年都有大批舊人讓出來，才可以和平的完成新陳代謝作用。但是，既然舊人離開了官場與教育界，也「退無以守」，則除非迫不得已，又如何肯讓呢？所以，從這個觀點看，如果一切情形不變，我們中國永久也不能實行英、美式的政黨政治。因爲在英、美、許多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往往也是工商各界或和工商各界有關的人，（也有少數地主階層的人，）如果在選舉時失敗，還可以退回工商各界或向工商各界中找路走。但在中國，從事政黨活動的人，卽使不是「黨混子」，也都是些「退無以守」的人。所以從團體說，便造成「專制」或「一黨專政」的局面；從個人說，便變成了「過河的卒子」。如果我們看清楚了帝國主義在我們社會上爲這些官兒們擺下的背水陣，我們對於他們的「退避賢路」或者「放下屠刀」等等，便很難寄以希望。

從這一點說，我們目前的情形比過去還要嚴重。因爲過去的知識份子，大都來自地主階層，政治上失敗以後，還可以靠土地過日子，所以唐、宋兩代的黨禍，其失敗的一方還有退路。但目前的知識份子，一則享受加高，土地的所得幷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一則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我們農村中的手工業被外國工業打倒了，從前農人賴以彌補其種田的收入不足的經濟來源斷絕，於是農民爲了要生活，向地主階層反抗，土地也不再是一個可靠的退路。這樣，目前知識份子離開了官場與教育界「退無以守」的局面，便成爲很澈底的了。我們不必旁求證據，大家只要閉着眼睛想想自己以及自己週圍讀書人的情形，便可以看出這個「沒有第二條路走」的危險局面。

無恥與幫兇

我們上面分析的關於知識份子「退無以守」的情形，還有一重意思。那就是說，這些知識份子，卽使除了做官與教書，仍然有轉業的能力，但一旦離開了官場與教育界，社會上再沒有他們願意從事的職業，也會像那些沒有轉業能力的人一樣，不能好好的挺起胸膛來做一個人。因爲一個人，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要好好的挺起胸膛來做一個人，一定要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以維持其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程度，在緊要關頭，有所不爲，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但是，既然這些知識份子離開官場與教育界便沒有正常職業與收入，自然不能有維持其生活程度的相當經濟基礎。在此種情形之下，如果他們還願意在舊社會秩序之中生活，而又不願意降低自己的生活程度或餓死，只有一條路走，那便是「賣身投靠」，在統治者的羽翼之下，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做一個幫兇份子。不過這樣做，會有兩種結果：一是喪失廉恥；二是剝削一般人民。爲什麼會喪失廉恥呢？前面我們曾經說過，他們都是官場和教育界容納不下的人，所以他們要想走進官場和教育界，（目前因爲教育界不易維持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程度，因此想進教育界的人愈來愈少）。不是在上者「求才」，而是在下者「求位」，下向上求，自然不能不卑躬屈節些。我們如果讀過了「古文觀止」裏的「報劉一丈書」，便可以想像出一般讀書人在求官時所表演的種種醜態。不說一般讀書人吧，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其幾次給大官人們「求位」的信內，却也表現得夠諂媚與卑賤的，且讓我們抄幾段在下面來作例。他在貞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上宰相書」中情急的說：「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年成，……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按韓愈當時留在長安）是果於自棄，……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過了十九天，宰相沒有回信，他不獨未行，而且再上一封「略不知恥」（這是宋朝張子韶的評語）的信，信內說：「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急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慼，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後十九日復上書）再過了二十九天，仍然沒有

囘信，於是又有「後二十九日復上書」，說是：「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閣下其亦察之！」又說：「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韓愈爲什麼要寫這樣「略不知恥」的信呢？這在他答「崔立之書」中說得明白。他自認他之所以「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的，乃是要「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乃是要「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他要維持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程度，所以要做官；然而官場已滿，要想打進去，只有用這種卑諂的行爲，去打動大官人們的心。自認木強的韓愈猶且如此，其他能力骨氣不如韓愈的人當然更不用說。用這種觀點來看我們歷代許多聰明人的卑鄙無賴，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時至今日，讀書人愈來愈多，什麼用抬棺材、絕食、投水、忸怩作態等方式來爭國代爭立委，似乎更不足以爲怪了。

爲什麼又會剝削人民呢？簡單的說，做官的人愈來愈多，政府的組織也便愈來愈龐大。然而這些增加的疊床架屋的機構，幷不是「興利」的機構，從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立場上說，增加與不增加，簡直沒有什麼不同。但是，這些增加的「官」與「機構」都是要錢支持的，錢從那裏來呢？分析到最後，還不是從老百姓那裏來嗎？所以這些多出來的知識份子對於加入官場的努力不成功則已，一旦成功，便增加一般人民的負担，在剝削階層中，又增加一些數目。剝削階層愈大，人民的痛苦愈深，統治者爲了要壓迫人民使之忍痛受剝削，其統治方法將愈來愈兆。雖然這種兇的統治，是維持這些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生活程度的基礎，所以大體上說，他們是擁護的，至少是不反對的，或者再退一步說，至少是不積極反對的。。因此，我們說他們是幫兇份子。

這種幫兇份子，和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除了寄生在舊勢力之中便不能生活的幫兇份子不同，其幫兇，往往是不自覺的。他們在社會變動的時代，雖然不易成爲革新或革命的力量，但因他們自付有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或者他們從事的工作僅是技術性或事務性的，其言行對政局往往沒有什麼大影響，所以也不會形成可怕的阻礙進步的力量。從時代說，鴉片戰爭以前，這種幫兇份子，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幫兇份子少些，愈到最近，因爲新教育的結果，這種幫兇份子在全部幫兇份子中，所佔比例，是愈來愈增加的。

進必以戰

上面的分析，也許給讀者一種印象，認爲這些社會上多出來的有能力的知識份子，都是些鮮廉寡恥，只夠幫兇的資格的人。而且，只要他們奴顏婢膝，願意幫兇，最後總可以在官場中找到一個位置。其實，事實幷不如此。一方面，他們之中，也儘有不願意卑躬屈節而却要挺起胸膛來做人的人，或不願幫兇而却要打倒剝削統治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些雖願意卑躬屈節和幫兇的份子，仍然在官場中找不着位置。這些人，在從前土地可靠的時候，還可以退隱田園，不求聞達。但這只是一種無辦法中的辦法，有些人，也許是大部份人，是不願意這樣自甘恬退而不求進取的。不過如前面所分析，他們進取的路線也只有官場；而官場舊人因爲別無退路，又只好死守，在此種情形之下，他們要進取，只有用武力，打倒舊官僚。所以我們說「進必以戰」。自然，他們之中，也有些不願意用武力而只願意用和平奮鬥的方法爲自己找出路，爲一般人民除兇的人，但至少從我們的歷史看，因爲他們無力除去那些靠舊統治圖溫飽而又退無以守的勢力，他們總是失敗的。王安石、張居正、徐光啓、康有爲等，便都是例子。不過，他們固然失敗了，他們代表的進步的進取的勢力並沒有消滅。這種勢力，在屢次失敗以後，終會覺悟到和平奮鬥沒有出路，乃逐漸走向民間，領導人民向統治階級武裝奮鬥，匯爲革命的巨流，我們歷代農民暴動領導層內的中堅份子，都是這些人。不過當時因爲思想、經濟等條件限制，這些人爲自己找出路的成分多，爲一般人民除兇的成分少。所以他們在起事時，雖往往有「弔民伐罪」的意思，但成功以後，不久也會變成剝削的統治階層。而目前，因爲西方文化的輸入，這一點已經變了，至少是大大的變了，似乎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

本文對於知識份子分化的分析，其主要目的還不在說明這一點。我們的目的，乃在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文之後，說明一個農業社會對於知識份子的負担是很有限的；超過了這個限度，則由於社會中知識份子飽和程度的不同，以及知識份子本身性格的區別，便產生分化。大體上說，這種分化是兩極式的：一是爲統治階級幫兇；一是革命。（如果教育界言論界是絕對獨立自由的，則此兩界中還可以容納一批「中間份子」；既然教育與言論不容易脫離政治的影響，則要大批人走「中間路線」似乎是不可能的）。鴉片戰爭以來，因爲西洋文化的輸入，以及帝國主義的影響，沒有出路的知識份子日多，人民覺悟的程度日高，更深深加強了這種分化的趨勢。由此分化而產生的鬥爭是更激烈的，由此鬥爭而造成的文化與社會的變遷也會是更澈底的。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於珞珈山

（上接第二頁）

要提倡一種可以屬於他們的文字。至於說原先提倡新文字的人現在都洗手了，這話是不確的。新文字運動的遭受挫折，也只因政府橫加干涉之故，政府是連提倡新文字也要給戴上紅帽子的，這還有什麼話可說？不過話若說回來，文字澈底改革之得能成功，原也需要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改革的成功來配合的。稍稍可以奉告的，世界書局出有多種陳鶴琴先生編的新文字書籍。拿我本人來說，贊成新文字，確曾身體力行，不像劉先生崇拜國語羅馬字，僅在名片上拼音，氣死不少洋大人，就算數了。我同一個朋友通信，應用新文字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很能夠表情達意，偶有不懂，只因不脫文人習氣，在白話中夾上了文言之故，或因拼錯了音，就像漢字寫了別字。

劉先生自已不就舉了四十幾個例，證明會說的白話反倒寫不出字來麼？這在應用新文字時便可迎刃而解，絕無問題的。因爲漢字已是死了，而語言却是活的。

劉先生又拿學英文學了十八年，仍然學不懂多少來打比，這又是根本弄錯了命題的。因爲所謂英文易學，只是指英國人學拼音的英語易學，而中國人學一個一個方塊漢字難學。提倡新文字，就希望中國人學拼音的中國字，能同英國人學拼音的英國字一樣容易而已。新文字决非外國文，這一點弄錯了，那就根本無從談起。中國人學拼音的中國字，怎能同中國人學外國語打比呢？請問劉先生，是不是？

劉先生說有人肯賣命，立刻奉陪。所以敢寫這封信投登貴刊，向劉先生請教。假如覺得沒有發表的價值，也請轉給劉先生以便討論。

仲曾　六、十五　上海

一位老太太的血汗

編者先生：有一位朋友的母親在民國二十七年存款一千元於交通銀行。這一筆款子是她出賣血汗艱辛積蓄下來，準備爲她的女兒的教育費的。本年初，曾托我到銀行提取。當時銀行當局告訴我還未接到部令，不知應照多少倍計算，要我們暫等些時候。今天，我又走到銀行去問，得到的回話是：照一千五百餘倍計算發還。這一千元就只能拿到一百多萬元！目前的一百餘萬元就能相等於廿七年的一千元麼？日前閱報，見爲救濟特捐事，立法院竟有一些立委們反對，以爲政府不應該幫助剝削「小貧」的豪門階級，爲甚麼對於這些「大貧」階級的老百姓的利益，沒人出來向政府爭呢？代表老百姓的立委們，似乎應爲這件事情向政府力爭，才能是眞正的人民代表呵。先生，廿七年的一千元，等於現在的一百五十餘萬元，政府這種措施，是公平的嗎？這樣的政府，千方萬計剝削老百姓的政府，怎麼能不失民心呢？

林其仁　六、廿二、蕪湖

開封失陷·在京豫人請願詳記

李錚

（觀察南京通信）中原戰局已成了不治之症，日益惡化，河南全省已無一個完整縣了，連省會開封現在亦告不守。除了開封，國軍在河南現在能控制的據點只有鄭州、商邱、信陽、和南陽了。除信陽形勢稍緩外，其餘三處都在共軍威脅之下。在今日說，商邱鄭州，已是兵臨城下，岌岌可危。這情形幷不自今日始，從去年十二月平漢路南段被破壞後，河南局面已經大壞了，從那時起，河南人就屢次請願呼籲，速從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澈底改革，挽回頹勢，但是未蒙重視，一切如故，毫無改新。全省既無一個完整縣，政治也就陷於癱瘓，政令不出省垣，各縣多失聯繫。專員縣長死難者日多。事不可爲，人人視爲危途，皆不願幹。省政府遴委專員縣長，稍自愛者，已無人應命，應命者多是別有居心的不逞之徒，更陷地方政治於破敗，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促成河南今日不堪收拾之殘局。開封隨時都可失陷，這點河南人早就看到了，今日省會成了戰場，成了火海，全省精華付之一炬，最後失陷，這是意料中事，在河南人看幷非意外。

就是因爲是意料中事，河南人纔特別覺得痛心。哭訴、請願、呼籲，京汴道上，踵接相望。五月中旬省參議會大會閉幕後，全體參議員依照大會決議，全體赴京請願，痛陳河南危機，請求迅速挽救。請願尚無結果，開封已被圍攻。來京請願的參議員、河南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旅京人士，他們的家屬親友多在開封，聽說開封被圍，更爲憂憤焦慮，連日在京集議商討挽救辦法。開封外圍是十六日夜間開始了攻守戰，初時共軍人數只有兩萬人，魯西大戰正在進行中，軍事當局判斷，共軍意不在攻取開封。攻魏救趙，企圖牽制魯西國軍，分散其兵力，以減輕對陳毅之壓力，佯攻開封，聲援魯西，所以向請願團表示，開封絕對可保，不必過慮。可是河南人幷不如此看，他們認爲局勢嚴重，奔走號呼，如瘋如狂。十七日上午一羣代表去到行政院見翁文灝院長，先由梁文穎副祕書長代見，代表們要求確保汴鄭，請總統履行三個月至六個月肅清華中共匪的諾言，減免河南征兵征糧配額，華中剿匪總部設鄭州，嚴整軍紀，其他還有救濟難民，收容匪區青年等問題。梁副祕書長很會說話，說得頭頭是道，乍聽很滿意，實際是說了等於不說，等於一事未辦。梁氏大概記的成語很多，代表們說到軍紀政風敗壞，逼民造反，他就說，「爲淵驅魚」；說到這也辦不到，那也辦不到，他就說，「一籌莫展」；說到某軍援內鄉不敢接近城郊共軍，遠遠用大砲打了五砲，共軍知援軍已到就退去，他就說，「將軍三箭定天山」。問什麼對什麼，應對如流，可稱「口給」。這樣的成語詩句，半小時談話中，梁氏總說了十句以上，可謂博聞強記。可是代表們幷不因梁氏之應對如流而滿意退去，却要求非見翁院長不可。後來翁院長親自出來接見了，對所提各問題，也沒有具體答覆。軍事他管不了，其他各問題，他說可向各主管部會洽辦。翁院長把一切問題推到各主管部會，代表們說他是責任內閣，應該負起責任。馬寒濤參議員說，現在開封危急，應請翁院長負責答覆，政府能以確保開封，才能討論其他問題；如開封不保，一切完了，都不必說。翁院長說，對此他不能負責答覆，須問何應欽部長。就以電話詢問何部長，一會兒回來了，說何部長說開封無虞，政府決不願意放棄開封，他對開封也很焦心。代表們把共產黨在河南的措施敍述給翁氏聽，他聽了非常驚異。對此好像前所未聞。代表們又說河南的軍政實情，民間疾苦，他也好像是前所未聞，連說糟心糟心。翁氏謙謙有禮，代表們印象甚佳，但問題却沒有得到解決。代表們不願分頭去找各主管部會，仍要翁院長負責答覆，最後說定由梁副祕書長定期招集各有關部會到院商討，共同答覆。

記者隨各代表下了行政院的大樓，出院看到這一座大樓中間的一個活動旋轉的六扇門，每一扇上都寫了一個「推」字，推着轉着。這不知是誰的匠心，巧設計，爲行政院做了這樣一種門，這個門不但代表了行政院，也說明了行政院，記者不禁會心一笑，暗暗稱奇。要想行政院能負起責任，遇事不推，非把那個寫了許多「推」字的門去掉不可。

當天下午五時代表們又去見何應欽，要何氏負責實踐三個月至六個月肅清華中的諾言。何氏急忙說，「我決不敢這樣說，我決不敢這樣說。」國大代表陳敏蘭女士提出××專打敗仗，怎麼能拿出手，爲什麼又委以華東剿匪總司令，看情形開封是非丟不可了。何氏很難置答，很不愉快的說，「那就很難說了」。說到軍紀敗壞，代表們歷舉事實，如數家珍，何氏聽了非常驚異，正如同對××將軍種種事迹都好像是聞所未聞。何氏對軍事甚焦慮，對軍械庫的空虛更表示惋惜與痛心，軍事上現在是何陳大換班。今日他再從陳手中接過來，班底子却空虛的多了，他怎不惋惜，怎不痛心。在何氏表示將以全力確保汴鄭的答覆後，代表們始滿意辭出。

共軍眞的要攻開封了，河南在南京的參議員、立監委、國大代等，又集議，十九日在大梁飯店開會，當場決定分頭向國防部、參謀部、總統府去請願，要求只有一個「迅派大軍，確保汴鄭」。除少數代表分別到國防部，參謀部外，其餘二百餘人於下午六時齊集總統府禮堂，要求蔣總統親自接見，負責保證可以確保汴鄭，否則決不離去。那時已過辦公時間，總統固不在府內，重要人員也都下班，一聲請願，忙壞了小職員侍從們，不久許靜芝局長來了，說了半天，多方安慰，多方解釋，均屬無效，非見總統不可。後來俞濟時、陳方兩局長也來了，算是替許局長解了圍。俞爲軍務局長，穿一件大衫，瘦小的個子，兩手交叉胸前，左肩傾斜，上下聳動，代表們看了頗起反感，因之他說的話也減少了分量。他將開封的軍事情形報告的很清楚，但不敢負責說開封可以確保。一方要見總統，一方力勸不必見，相持到深夜十二點半，始在明日上午九時推派代表三人來見總統的協議下，代表們不滿意的離去了。

次日上午，推了五位代表去見總統，開封的戰事更惡化。總統及代表們心情均沉重。總統一再說應該相信政府，相信他，聲色頗厲。代表們要他六個月肅清華中的諾言一定要兌現，自然談的不投機。一位善跪多淚的代表段劍珉，說着就又哭着跪下了，總統更爲不樂。結果又是在口頭答應迅派援軍，確保汴鄭的諾言下代表們退出了。

十七日開始攻城，十八日就發生巷戰，二十日開封只剩龍亭一個據點了。二十日的夜間開封的攻守戰即算結束了。二十一日空軍却向開封城內投擲了四十噸炸彈。共軍攻入城內，空軍大肆轟炸，代表們更是情緒壞，心理沉重了。不約而集合在中央飯店孔雀廳開會者三百餘人，未有決議，大家高呼到總統府請願去

（下接十四頁）

關於雲南最近治安情形的詳細分析

伯駱

（觀察昆明通信）肇致滇省目前治安極端不靖的主要原因，表面上是匪風昌熾。匪亂正以驚人的幅度，在雲南各地漸漸成長，逐次擴大。客歲十一月以前，滇省治安，堪稱謐靜。恰如深山密林中的一泓碧泉，清寂無浪，景色宜人，可謂得天獨厚。盧永衡主席提出「安定中求進步」的口號，其理由就在雲南社會當茲亂世紛紛之際，猶呈現着獨特的安定之故。事實上呢？那份「小康之局」，不過是片面的安定的「假象」，並非完全的安定的「眞象」。雲南雖不直接受到內戰炮火的洗禮，但另一方面，一個因內戰而造成的嚴重的民生問題，早就在無形中開始醞釀揭破安定的裱糊了。就彷佛暴風雨要來前夕的情形一樣，在靜裏，使人敏銳地感到無限的沉悶陰森和恐怖。那種靜，決不是爽朗清新和光明的朝晨所有的靜。十二月以後，瑞麗、瀘西的民變事件，接連暴發，有如春雷初申，開始顚破安定的假面。「民主聯軍」的旗幟，出現於三姚邊境，彷彿電光閃閃，凝固的陰雲，已被撕裂。繼之而來的是「失城陷地」（關坪、師宗、屏邊）的暴風。和各地「股匪猖獗」的急雨。於是，川洪暴發，激流滾滾，混濁洶湧的巨浪狂濤，吞捲了碧泉的紋波流漾。到現在，剩給治安當局的，最難於收拾的是：「民不聊生，盜匪如毛」八個字。民越不聊生，盜匪越多；盜匪越多，民更不聊生！這成爲了一個惡性循環。

騷擾於雲南全境的匪類，大概可別爲四：一、「零星草寇。」這一類匪，顧名思意，卽可知其情形。幹的無非要路剪徑，打刼行商，人數不多，但很普遍。表面上看，似乎不足爲患，實際上則代表着社會嚴重現象的根本。理由很簡單，有吃有穿生活安定的人決不會冒着生命的大險，去幹殺人、越貨的勾當。唯其不能以正當手段，在這上需的社會裏，找到合法合理的生活的保障，一挺而走險」是人生三十六着裏最後的一着了。這樣，比起餓死街頭，冷斃牆脚的善終，要合算得多。於是，生活愈難，這一行列的數目就加多。目前雲南社會，主要問題就在於零星草寇太「多」。這個「多」字，一方面是說明人心道德淪亡殆盡，另一方面，明白地指出了在這人心道德淪亡殆盡的社會上，沒有飯吃的人太多。自古以來，歷史的轉變，終底只爲「麵包」問題。沒有飯吃的人太多了，將引起另一種結果是可想像的。六月張風襲來，一週之內，物價上漲百分之一百以上，這不知又將從生活的行列裏，擠出多少沒飯吃的人來。言之殊覺心驚胆戰。二、「綠林響馬」。這一類人，有的是道地匪幫，例如滇南的白小七、白正貫、趙裔昌等股，滇東的中三猴子、王小老飛等股，滇西的李世良、劉金五等股。這些是在地方上生了根的匪幫，靠山吃山，近水吃水，高興起來，接受政府的招安，有了生意，又失約背叛，反出朝歌。有的則是新興英雄，例如滇東的楊體元，滇南的李荷才、李洪祥，滇中的張副官（按張部最近活動於昆明嵩民梁王山一帶，前有竄擾昆明市郊長蟲山之說，駐軍某部曾於五月十六日晚派隊打了一次夜仗，次早檢視，山上空無一物一人，假若不是吉訶德錯認風車，那麼股匪簡直逕叩雲南首府的門簷了）等股。「響馬」們有的到處攢隙流竄，有的札根不動，踞山爲王。出則打家刼舍，進則滿載而歸，鬧來鬧去，眼看着已經進步到「攻城奪寨」了。這一類匪的人數，多寡不一，譬如元江李荷才股多到「擁部三千餘人」，少者亦在數十人。所以稱爲股匪，乃形容其聚衆甚夥之故。在雲南，民間自衞武力太差，政府在照顧不暇的情形下，這一類匪要想「卽刻完全肅清」，事實上亦難於做到。（警總馬副司令瑛談話，見五月二十日正義報）不僅如此，在最近甚且有官匪眞正合一的現象了；例如前鎭雄縣長隴鈞府忽率七百餘人反叛，宜威縣參議長以物資運資匪區，雙柏縣參議長勾結股匪搶刼商旅，永勝縣長和吉光縱放涼山匪目余從高……等諸現象。由這些情形看來，股匪非但擾亂治安，並且勾通官紳了，官匪合流，暗掠明搶，總歸吃虧的是小民。三、「抗剷變民」。這是一個特殊的組合。變民一不搶人越貨，二不打家刼舍，政府派糧派兵依然接受，苛捐雜稅照樣完納，只有一點是和政府站在對立的方面的，那就是種植鴉片。政府要禁，好說當然格於國法，礙難邀准，惡說呢，只有訴諸武力。政府派遣軍隊查剷，變民就組織武力對抗。如果政府妥協，變民仍是順民；政府強硬，順民就變成暴民了。這算是最難解決的一項問題。談談條件嗎？面子上去不掉，國法上也去不掉。不默契嗎，事實上又阻礙重重。眞是夠禁煙當局大傷腦筋了。日前復興晚報有則短訊：略稱雷特派員醒南表示雲南禁政阻礙太大。以此觀之，能否禁絕，頗成疑問。種烟的主要目的在圖厚利，盡人皆知，但圖利的正當手段，決不止此，爲什麼農民偏偏要犯法違禁，甘冒極刑，從事種烟？分明知道政府要派軍隊來打麻煩的，而事實上又把烟籽播到地裏？理由很簡單，一句話，農民在過多的苛負重壓下，不得不拋棄得不償失的正當農耕，而冒着絕頂的危險種植鴉片。如果說小偷多是表示社會道德的淪亡，那麼，種鴉片却象徵了在農村經濟破產的情形下，農民自己被動而又主動的想找出最後一條生路。四、「民主聯軍」。這是比較籠統的稱法，所謂民主聯軍，官方目之爲「奸匪」，人民稱之爲「共產黨」，民主聯軍是他們自已打的旗幟。這一類人，這四個字，最初出現於滇南思普邊區，領導人是劉昆府，惟僅曇花一現，便被政府打垮。本年初，滇西三姚一帶，又出現了「民主聯軍滇西縱隊」的軍銜，首領爲段英，從一月到現在，盤據半年之久，官方動員兩千兵力，六縣聯防圍剿，才把段英主力擊散，惟尙未澈底清除。近來這個番號，又出現於滇東羅平、師宗、宜威、平彝、路南、瀘西、彌勒、霑益、邱北等縣，不過，字眼略有更改。據官方公佈爲「中國革命雲南民主解放軍」，領導人係延安抗日大學畢業生及前十八師團長朱家璧，並聞有共方團長徐甯生佐助，其活動情形頗爲積極，參加份子亦甚複雜，有大學生中學生，有教員公務員，有失業軍官。這一批人的總數，迄現尙無確切統計，但就其活動地區廣泛一點觀之，段英、劉昆府均難望其項背。目前朱部活動的四大原則爲「抗兵、抗稅、抗糧、抗剷。」恰好這四種負担又是九死一生的人民所渴望解除的綑綁，朱部之所以能夠在極少政治思想的人民當中，發動並推進共產主義，理由就在於此。引句西諺：「一切爲了人民」，爭取羣衆，是要從實際生活中減少人民痛苦，進而造福民衆才行的，不是得三兩張「極表關懷」的一紙公文所能奏效。細菌的寄生條件是腐爛，時至今日，「防止奸匪」固屬政府決策，但是

檢討自身比任何事情更爲重要。現在有問題的，並不單是朱家璧在滇東一角的發展，而是太多的腐爛在那裏靜待着藥劑或病菌呀！誰掄了先，誰就勝利。

最重要的，必須指出；這四種人却又有意無意的走向一條必然的道路，那就是「民主聯軍」。已有的事例如此，理論的推測亦復如此。先說「零星草寇」。匪越鬧得厲害，治安當局的辦法也會越有進步的，綏靖大的股匪固感困難，防範三五成羣或單身剪徑的散匪，則無問題。散匪方面，在此情形下，要幹呢，又抵不過政府的防範緝拿，不幹呢，社會上並無容身之地。這一矛盾，使散匪立足問題有了變化，於是，爲着存在，他們本能地或則投入已有的股匪帳下，或則聚散爲羣，自成一股，以期有力量和政府的治安刁難，而維生存。前者如段英部下的一些轉業而失業的軍人，後者如滇西李世良的烏合之衆。生活不斷地把散匪製造出來，就是說，替未來的股匪打基礎。再看股匪，據官方明白公佈，「奸匪勾結股匪爲患」云云。由此觀之，連政府也承認「股匪」的歸宿是「奸匪」（民主聯軍）了，我們不必再舉實例。這裏附帶說一說「股匪」變「奸匪」的原因。股匪既屬法律以外的人，政府當然不容許其存在，蕭清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剿，二是招安，在雲南的高山峻林中剿匪是頗不容易的。這多年來，政府無日不在剿匪，非但剿不絕種，反而有日漸加多之勢。由最近官方公佈匪亂的情形之頻繁看來，剿的收效，追不上亂的擴張。招安方面，不是寫張「悔過書」就了事的，把匪「招」來，主要的是在「安」插，如果招而不安，也是枉然，反而讓匪混進社會，舊態復萌，爲患尤烈。事實上政府那裏有這多地方來安插，來滿足桀傲不馴的騎士呢？政府方面剿既不易，撫亦無效，唯有聽天命盡人事而已。在匪方面；招既不得所安，洗刼下去又無好結果，於是，本能地會考慮到出路問題，換言之就是想找出一種適於自已安心存在的法度體制。人類政治意識，就是從切身生活而出發的。恰好在這種時候，一個與政府對立的黨派，（共產黨）在那裏號召，股匪在苦悶之餘，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攏反政府的行列。因此「奸匪」之能「勾結股匪」，就是根據這一邏輯，雖則「股匪」還不明白「奸匪」的目的性是甚麼。我們再看「抗劇變民」，照官方公佈共黨份子的工作項目中，包括着一個「抗劇」的節目，這點可以充分證明，他們爭取的民衆是有「抗劇變民」在內的。事實上警總發言人也說，某些地方的民變抗劇是共方策動的。足見得變民也走「民主聯軍」路線。綜合上述，得了一個結論：民主聯軍是其他三種暴民的歸宿。

我們再來看政府。治有治標與治本二端；前者包括進剿和安撫，後者指根本改善民生。在遍地哀鴻的今天，談改善民生，等於癡人說夢，事實上做不到。當局對於綏靖滇省治安，據我們所看到的，還是只能努力於治標方面，但是治標方面，也還存問題；零星草寇無從言撫。綠林響馬，有招無安。抗劇暴民，又不能實國法於不顧而有所默契。民主聯軍則根本就在戡剿之列。唯一辦法，只有東撲西剿，武力對付。在雲南，可資使用的兵力計有二十六師一師正規軍，憲兵一個團，保安部隊共有六個團及一個獨立大隊，總計以上人數不出兩萬，拿來供應雲南治安的需要，頗感拮据。本年四月間，滇省治安高潮嚴重，警備總司令何紹周氏晉京面謁最高當局，據說主要任務，端在請兵南援，恰值「三北」吃緊，中原動搖，當局處於巧婦無米的境況下，愛莫能助，竟分不出一個現成的卒子來，但又不能不管，結果打了一張遠期支票，准何紹周在中央軍二十六師裏擴充三個團，新兵則侯黔省壯丁登場，再行撥交。至於地方部隊，省保安司令部雄心勃勃，擬將原有保安六個團擴充十個團及一個獨立大隊，額外增編一百四十個保安直屬連，總有人數爲二萬七千名，經費預算均經編定。殊知呈報政院所得結果，難邀照准，甚至連原來的經費都折扣着核給了。於是有人揣測，中央這種厚此薄彼的做法，是怕地方勢力大了難於控制。擴充保安部隊之請既已告吹，行政院又頒來一份「自衛特捐籌集辦法」，顯然是叫地方自已打算。省政當局，現正根據這項法規，積極設法籌集一萬六千億的保安經費，以資應用。自衛特捐之征收繳納辦法，業已公佈，只等中央核准就可動作。該項特捐照規定應以殷實富戶爲征收對象，是否能做到有錢出錢，則要看窮苦小民的運氣了。另外，省參議會第一屆五次會上有人堂而皇之的提出取銷「救濟特捐」的主張，理由是在：既辦自衛特捐，就不應辦救濟特捐，以免重複。而且救濟特捐不過是消極的措施，自衞特捐乃積極的防衞。這項主張竟通過報請政院取銷。我們並不奇怪有人替豪門資本辯護，只覺得若干哀鴻不僅將失掉唖餘恩施，（按救濟特捐係指定賑卹貧民），並且將更被排剩出生活的行列了。因此取銷救濟特捐辦理自衛特捐就等於對窮人說：「與其救你，不如殺你。」參議會所謂的積極消極也者，理由不外於此。至於縣地方的防衞，第一步保安司令部發給每縣手榴彈二百顆（美國造），放在縣府，作爲剿匪之用。第二步向中央請領步槍五千枝，分配給全省一百三十一縣應用。剔的方面，尙無所聞。以上是當局在「治」的方面給人看得到的對策。這些軍隊的擴充，武器的配發，是否就能把雲南治安底定，須待事實證明。如果從實利主義的觀點來看，記者以爲：U·S·A的槍炮，對雲南治安無補實際，倒是山姆叔叔的生產機器，還能救活幾百萬的高原人民。

（上接十二頁）

，不得結果，死也不同。於是大隊開到總統府。總統不在府中，再到官邸請見。這一次聲勢浩大，羣情洶洶，局長們應付不了，由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參軍長薛岳出來應付。代表們，哭的哭，吵的吵，罵的罵，跪的跪，尤其是女聲，一時緊張混亂，弄得秦薛也無法應付。開封正進行着激烈的巷戰，地面兩方砲火，空中飛機投彈，開封城內有近十萬居民，有五萬學生，有一萬多公教人員，代表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至親、好友、都在開封，他們怎能不哭不急？感情確是不易抑制的，在這種情形下，總統自然不便親自接見，在多方勸解安慰下，勸他們回去。明日上午，總統一定在總統府親自接見，并說援軍已接近城郊了，開封情況卽可好轉，代表們始退出。

二十日，代表們再去總統府時，總統已乘機飛往前線，親自指揮作戰了。代表們有一項要求就是請總統親往指揮，現在總統既飛赴前線，也不好再說什麼，將書面要求，交與薛岳，薛氏表示一一接受後，他們就出來了。

總統離京，請願也無對象，同時開封城也已失陷，旅京豫人注意力又集中在開封家屬親友之安全問題上。請願高潮一時低減，都在注意打聽開封出來人的消息。人人都面現愁容，許多人以眼淚洗面，終日哭泣。開封的要人直至現在，已脫險到鄭州的有省黨部主任委員燕化棠、黃河工程總局長陳泮嶺、建設廳長宋海泚，別的尙無信息。陳泮嶺從鄭州電旅京豫人，說飛機盲目濫炸，居民死傷無算，學生屍如山積，電文中極表憤慨。河南人又火了，再起而爲濫炸開封而抗議，對開封失陷責任問題他們也要追究。事前疏於防備，（僅有三團國軍）臨事又不能及時應援，到共軍已攻進城，事無可爲，又不顧學生居民，盲目濫炸，死傷過當，這種種責任，他們都要追究。

六月廿四日

文藝

殤

汪銘

端午節的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正忙着給孩子們洗澡，忽然聽見門鈴響，我覺得一定是送報的；因為送報的每天是這個時候來的。可是我的大女兒從門外並沒有拿回來報紙，她說是一位面生的客人。我便跑了出去，見了面，也是不認識。

「您貴姓？」那來客恭敬地問着。

「我姓尹。」

「您是尹先生嗎？」

「是的，您找那一位？」

「我是特地來報信的，戈金今天早晨六點鐘故去了，戈太太是我的姊姊，她讓我來給您報信。」

「是真的嗎？我同戈先生前兩天還見着，而且談了很久才分手的，怎麼會……」

「他昨天還上街買菜過節的，今天就死了。我們全沒想到。」

「您貴姓？請進來坐坐。」

「我姓張。改日再來吧，我還要到學校去有事。」

「那麼，我不讓了。」

「再見！」

「再見！」

我目送着那位來客——一個年青的大學生——走去，我站在門口呆住了。我想起小戈的一切——他的陰沉的面孔，可是說話卻時常帶着詼諧的口吻。有時候諷刺一件事或者挖苦一個人，他可以不加思索地脫口而出，不但不勉強，而且語必中肯，諷刺的恰到好處，挖苦的正中要害。我常常對他開玩笑地說；「像你這種人，真是聰明過分了，祇怕是要短命的！」沒想到我的一句戲言，竟會成了小戈的讖語了！

× × × ×

我同小戈的訂交，是遠在勝利以前的兩三年。彼時我們兩人都在敵偽時期的一個機關裏作着最低限度的公務員，不過我的待遇，稍微的比他多一點。可是那時候的物價，也像目前似的天天在往上漲，我們的生活，時常感到恐慌，差不多每月一光，很少有一滴滴的多餘。我們有時候發着擬想，我們想着到內地去。可是這一筆路費又從那裏想辦法呢！我們計劃着存錢，可是始終也沒有把錢存起來；我們策劃着怎麼樣的走法，可是始終也沒有走得成。我們常常地計劃，但是結果終歸是一種妄想，直到勝利也沒有實現！

× × × ×

在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天，小戈才從日本憲兵隊裏給放出來。他的被捕是我所意料之外的事。據他說他不是什麼地下工作的義士，他不過同一位真正地道的地下工作者來往，事前他也不知道這位朋友是地下工作者，他的朋友被捕了，連帶着也把他抓了去。他挨了幾個嘴巴，受了幾腳踢，監禁了一個多月。他說他覺得這種侮辱是應該領受的，至少是給他充任敵偽小公務員的一種懲罰。這種懲罰是應當等待中國政府來執行的，可是他卻先中國政府之來而受到了。他認為良心上稍為安然些，他覺得無論如何，總算是陪伴着義士而受到了苦。

不過我不大滿意他的這種觀念，我認為這是一種阿Q的感覺。我直言地指責他在走進阿Q的思想裏去了。他沒有反辯，可是他說；誰又不是阿Q呢？在淪陷的人們！你！我！他們！全是阿Q！

我們看着國軍與盟軍的一批一批的開到北平；我們擠在人羣的裏面；我們的血液在奔騰，我們兩人緊緊地拉着手跟着國軍的隊伍跑，高喊着；「中華民國萬歲！」小戈的眼淚永遠也揩不乾了！我曉得他是在高興地流淚。我們沒有漏過一次班，為了歡迎國軍，天天在跑馬路。何司令來了！我們在馬路上跟着他的汽車跑，我們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多麼渺小。我們好像多年沒有見着娘的孩子似地辛酸而又快樂。我們竟忘記我們曾經是敵偽的小公務員了！

在我們參觀過雙十節北平太和殿受降典禮之後，我們也就跟着受降而被懲罰——失業了。

「玩完！我們跟着日寇一塊兒玩完了！」小戈在接到被裁的通知書的第二天來找我，進門的開頭第一句話。

「不要緊，我們還年青，有的事情好作，何必着急！」我安慰着他。

「我不着急，不過找什麼事情作，我們的『偽』字可是去不了了！」他慨嘆着。

「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沒有做過對不起良心的事啊！小戈！我們沒得怕！」

「算了吧！你這個地道阿Q！」

「怎麼？難道他們認為我們是甘心附逆嗎?!」

「唉！老尹！這種精神的抗日，比不起人家行動的抗日，勝利的果實，不是你我所應得享受的，獃蛋！」

「……」我想不起話來了。

× × × ×

後來，我考進了一個機關去做最低限度的公務員了。可是小戈一直也沒有找到事情做。他時常來找我談天，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地從天上的星星 談到地上的螞蟻。他好像不急於找事情做，可是有時候卻正經地問我有沒有機會。我也曾經為他託了不少的人，總是沒有成功。在這三年之中，他賣了他父親所遺留給他的一所房子，又賣了不少他父親所心愛的字畫，負擔着一家四口的生活。他沒有兄弟姊妹，除了一位七十多歲的母親同一位二十幾歲的妻之外，還有兩個小男孩——大的是七歲，小的是四歲——在物價像潮水般地高漲的這個時代，想像中他是一天比一天地感到威脅，覺得恐慌。可是我卻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苦臉。他每次見着我，總是高興地談着，談着一切大小的希望——大的是中國前途的光明，小的是個人生活的安定。

不過，在最近的幾天，我覺得他有點變了。他不大好談話了；也不希望這個，也不希望那個；他似乎一反以前在希望之中生活的態度而走到失望的圈子裏去了。在我最後一次見着他的時候，他問我：

「老尹，你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熱情，還存在嗎？」

「很少了，可是不能說沒有。」我答覆他。

他默然了好久，於是發表了他的見解。

他說：「不錯，也許還有，不過我是看不見的了！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熱情是先天的，後來因為生活的方式不同，言語的隔膜，利害的衝突，使得人與人之間發生了一種防衛的情緒。這種情緒的增長，於是乎把人與人之間的熱情給泯滅了！猶其是在我們中國裏，人與人之間，沒有熱情可言。一塊兒下館子吃飯，互相爭着付帳，可是那個真的付帳的人不見得是出於本心，輪到那兒了，沒法子。我們再有難處吧，你要求他一百，他總得折半付給你，否則他也許在全部付給你的時候，要說很多苦情的話，好讓你知道他是在勉為其難，而並不是力所能辦，以後你也就不致於再找他了。還有……唉！不說了 總而言之，彼此都在互相應付，熱情兩個字是談不到的！」

「不見得吧報上，不是常常刊登着有自動濟貧的事嗎

（下接十六面）

書評

讀胡適之先生校足本密爾自傳書後

吳恩裕

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傳，英國最早出版是在一八七三年。美國最早的本是一八七九年出版的。這些版本當然都不易得到了。現在流行的本子是他的從女海倫台樂女士（Miss Helen Taylor），在密爾死後出版的。牛津大學出版部「世界名著叢書」中，和許多其他小叢書中，所收的都是這個本子。此本顯然地有許多刪節之處。根據拉斯基教授（Prof. Harold J. Laski）給牛津本密爾自傳所作的序文所言，這刪節大概是關於密爾從女台樂女士的，而且是她自己刪削的。

今年三月，胡適之先生把他所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印行的密爾自傳借給我。這部自傳是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據自傳內封面所寫：手寫的原稿是哥倫比亞大學收藏的，付印時毫無修改及刪削據以排印，並有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副教授考斯（J. J. Coss）一篇短短的弁言。毫無疑問地，這是一個可貴的本子：因為從這本子裏，我們可以窺知坊間流行本中被刪去的倒底是些什麼。

有了這個本子，固然是方便了。却還有更方便者在。胡適之先生在一九四〇年並曾用一八七九年美國 Henry Holt and Co. 本，和這個本子校勘一遍。胡先生校後附記有云：『……記出兩本的異同，作為 Dr. John Jacob Coss 的紀念。Dr. Coss 原序太簡短；在他死後，我才見此本，故試作對校，使人知此本的好處』。這本自傳有的章節，假如為一八七九年所無，當然更是今日坊間流行本子所沒有的了。

胡先生校的很仔細，我據他校過的本子和牛津本比較一下，結果發現：牛津本被刪去的地方，幾乎都是關於台樂女士的。可知牛津本確是以台樂女士所刪削的本子為底本。她為什麼要刪削呢？我們現在當哥倫比亞大學出版部藏自傳全稿所附一條附記中，可以找到一點線索：

『密爾自己寫的自傳。在我死後一年之內不必修改，不必刪削地出版。　海倫台樂。』

這是台樂女士自己寫的話。由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她並不是絕對不願意旁人曉得她所刪削的部分；她祇是不願意旁人在她生前曉得那些被刪去的部分而已。在上面這幾句話裏，她分明告訴我們：完全無缺的原稿（包括她自己刪去的部分），是可以毫不加以改動與刪削地付印的，祇是她的條件是必須在她死後。

她何以要刪去那些地方？又何以必須在她死後才可以將刪去的部分叫人曉得呢？

關於這點，有一天適之先生和我說，大概是由於台樂女士的「自謙」。因為被刪去的地方都是極力贊揚台樂女士的。例如他說：『雖然我最好的思想的鼓舞者已經不在我身邊（裕案指其妻之死），但我並不孤獨：她留下一個女兒，我的從女，（案以下著〔　〕內之句語均係被刪者，下同。）〔海倫台樂女士，她母親的智慧及其一切高貴性格的繼承者〕……』（頁一八四）。他又認為台樂女士是他的『……〔另外一個稀有資質的同伴、激發者、顧問、指教者〕』（頁一八五）。他說：Subjection of Women 一書是『……〔由我的從女慫恿〕而寫的。〔其中曾用我的從女一些重要的思想來充實，並且有些段落是她寫的。〕……』（頁一八六）。當時英國的婦女選舉會，密爾也告訴我們是：『……〔由我的從女的創始的〕……』（頁二一四）。此外還有被刪去的重要地方如：他說在某時期有一大部份信件都是由他的從女兒代覆的，起初是由於他的從女看他信件太多而自願幫忙，但後來的幫忙，就是因為密爾自己覺得她寫得比他自己寫的好了。以後即使是密爾自己寫的，也有她的修改。他還有一些「最成功」的講演詞，也是他的從女作的。（頁二一六）

由以上所舉的刪去的句話，可證其所以被刪，大體是由於台樂女士大的自謙。但是我們終於不免疑問：第一，如果密爾這些話都是真的，照外國人的習慣，她不應該自謙，尤其不應該為了她自己謙遜，而把旁人的著作任意刪削。第二，再不然，我們祇有假定密爾所說的話不大情實了。可是這又費解：因為倘如此則台樂女士若刪就索性永遠把它們刪去好了，何必又在稿本末尾寫『密爾自己寫自傳。在我死後一年之內不必修改不必刪削地出版』之類話呢？

我認為台樂女士所以這樣做的，是和密爾在自傳中非凡地贊譽她的母親（密爾的太太）有關。密爾在 On Liberty 一書前面的獻詞中，在他的自傳中，都對於他的太太恭維備至，認為她是人間罕有的天才；認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其最好的見解，幾乎都是他太太的。關於他太太的天才及其對於密爾著作實質的影響，本來在密爾生前，就曾經引起了朋友們的辯論和懷疑。Carlyle和密爾其他的朋友，大都以為密爾的太太可能很聰明，很能理解密爾的思想，也許很能把它們用簡明的例證或語言，加以說明。若說密爾所有淵深的思想都是她的，未免過譽。對此種爭執的討論，台樂女士必非不知。因此，她可能因為：母親既被贊譽得非凡了，却又來贊美女兒，而且也是非凡的贊美；即使那贊美之詞，都是真的，台樂女士也「可能」自已覺得不好意思。於是，索性就留到她死後再發表好了。

六月廿七日　北大紅樓

（上接十五頁）難道他們不是出於熱情？」

「……」他不說了，可是他的神色表現着沒有心服的意思。

我們開始談到旁的一切新聞與批評，可是在我們臨分首的時候，他說；「我很懷疑，懷疑自己，怎麼就會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熱情了呢？如果你說還有熱情在人間，那麼我一定是一個最殘酷的人了！」

×　　×　　×

我現在想起了他的最後遺言；他看不見熱情了。因為看不到人間熱情，所以才懊喪地死去。同時我又感覺到近來的物價，也是小戈的致命傷。物價的高漲是人為的沒有熱情的表現，無怪乎他看不到熱情了！我也開始在懷疑了；我懷疑着小戈是不是最殘酷的人呢？他拋棄了廿六歲的妻，七十五歲的母親同不滿十歲的兩個孩子而毅然死去，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啊！可是致他死命而不准他撫養老小的兇手又是誰呢？這個兇手是不是最殘酷的人？比死者更殘酷！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寫於北平

本刊啓事

（一）上星期五紙價從一千二百萬（一令）跳到一千七百萬，第二天星期六又冲出二千萬。這一個月的排印工也要上漲很大的百分比。出版事業，瀕近絕境。我們慎重考慮，為了減輕讀者的負担，決定暫時縮減篇幅，改出十六面，售價八萬元。（二）篇幅縮減後，長文章登不下，以後各方惠稿，通信請以三千字為度，論文最好在四千字左右，最長請勿超過五千字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每册八萬元